

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概覽

劉家正著 勞寶霞譯

九二年初南巡，以及同年十月中所舉行的十四屆黨大會，都確認了這條路線。

(編者按：本文為耶穌會士劉家正神父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出席美國三藩市第十三屆美國天主教中國問題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蒙作者慨允轉載，特此致謝。)

我相信為這個會議的大部分參加者來說，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是最近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一個容易掌握的基點。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中至六月這連續七星期內，大眾傳媒的現代科技把在這個中國古都所發生的事情傳遍世界。正當「天安門事件」記憶猶新之際，中國已開始另闢蹊徑，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國家「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九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國家主席毛澤東在廣場上高聲宣佈：「我們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註三）為當時不少人來說，中國共產黨及其政績的確遠勝於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後者被猖獗的貪污和失控的通脹弄致奄奄一息。諷刺的是，這些問題正與中共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前所遇到的問題大同小異。所不同者是目前在中國之內，除了共產黨便沒有其他黨派可讓人民去自由選擇。

信仰危機

中共起初憑著強而有力的中央管治制度，很快便在重整經濟結構和維持社會秩序方面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這情況一直維持至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期間（一九五三年至五七年）。今天，不少人仍懷緬昔日五、六十年代的光景。為他們來說，這些日子是福利和「虛彷平等」的保證。那時候，集體意識高漲，黨風優良。人民無需為社會穩定和日用物價的起跌而擔心。（註五）

可是，中共因為急於求進地加速發展的步伐，大膽地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和新社會，以致犯了嚴重的錯誤，「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惡果便是最佳寫照。據資料顯示，約有三千萬人在「大躍進」之後的「三年苦戰」中死去；另有二千萬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喪命。後者更令一億受害者的身心造成難以磨滅的創傷。（註六）

據資料報導，在那時接二連三的群衆運動之中，「鮮有一個中國家庭能在經歷這些殘酷事件之後不留下一點創傷。」（註七）學者 Anne F. Thurston 曾這樣形容當時的情況：「失去文化和精神價值；失去希望和理想；失去時間、真理和生命；總之，差不多所有對生命有意義的東西也在那時候失去了。」（註八）（我們可以見到，類似的情況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亦有出現。）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深遠的「信仰危機」；即所謂「信仰的三重危機」：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對共產黨失去信心及對國家四個現代化（工、農、國防、科技）的將來失去信心。（註九）最後，正如原罪學家 Stuart Schram 所說：「只有在一個能夠取代現有建制而又可信賴的信仰和價值系統冒升起來時，才能填補由文化大革命神話所遺留下來的真空狀態。」（註十）

經濟改革

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逝世，中共在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舉行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般公認爲是揭開毛澤東之後由鄧小平所領導中國改革的序幕。在一個較爲開放的氣氛下，中國人能有較多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中國知識份子很快便察覺到自己的國家較別的國家落後。他們明白到這種情況與中國上千年中央集權制度有關。

因此，改革、振興和對外開放便成爲當時的最高指示。按鄧小平的話說，這情況便猶如展開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展開這場革命……不單四個現代化會沒有將來，黨和國家也可能會因此滅亡。」（註十二）

經濟改革以「農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這制度的重要性有兩點：（一）生產量與個人報酬掛鈎，多勞多得。（二）在決定生產和分配產物方面，農戶可享有較大的自主權。結果，農業產量大增，農村經濟漸漸復甦起來。據一個內部報告指出，在一九七九至八四年間，中國穀物產量平均每年增加了千七百億公斤，較一九五三至七八年間的穀物平

均年產量七百三十五億公斤增加了一點三倍。同時，個人平均生產總值亦由一點一五公斤跳升至十二點八五公斤。而農民的年均收入也由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至一九八五年的四百元。（註十三）農村經濟改革得到良好成果，鼓勵中國政府進一步進行經濟改革，把「承包責任制」應用到企業

之上，務求將經濟系統由僵化的史大林式中央計劃模式，變成一個所謂「國家調控市場，市場主導企業」的系統。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宣稱，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個建基於公有制的計劃商品經濟。（註十四）這個新制度是要取替以前「企業吃國家大饅頭，工人吃企業大饅頭」的制度。

在一九七八年，幾乎全中國都奉行計劃經濟。但在一九八八年，差不多已有一半的經濟活動是以市場經濟模式運作。據一九八八年底的資料顯示，由國家定價的產物，農產品只佔四成，重要生產資料佔六成四，工業消費品則佔四成半，其餘的貨品

按指導價或市場價發售。（註十五）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政府決定要「硬闖」物價改革的難關。

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搞私人經濟的老百姓和政府幹部便有相當的機會致富，前者在自由市場內賺錢；因著中央權力下放及地方自治機會的增加，地方幹部得以透過政治影響力或所謂「權力商業化」來操縱貨物的買賣。總之，中國的「雙軌制度」在無形中製造了不少不正之風，新舊問題一齊來。（註十六）

新政策導致大眾需求日增，人民對改革的期望越來越高。官方公佈的零售價數字顯示物價逐年趨升，一九八五年上升百分之八點八；一九八六年是百分之六；一九八七年是百分之七點三；一九八八年是百分之十八點五；一九八九年是百分之十八。（註十七）不少觀察家相信實際的數字會更加高。一位駐北京的外國特派員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表示：「全年通脹率約為百分之廿七。」（註十八）一般來說，依靠固定收入的人會較為窮困。在這些人當

中，知識份子和大專院校的學生受到嚴重的打擊。正如前述，這些問題源自人民的不滿情緒，因

為改革給他們太高的期望。而且，公眾的期望亦越來越被極端化：普通人希望得到安全；知識份子要求自由；而幹部則追求成功感。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人民起初只不滿工資追不上物價的升幅。漸漸地，貪污腐化、機會不均、官倒等問題令人民更加不滿。（註二十）

以上的問題是其中一些促成「天安門事件」的主要因素。一位在過去被認為是好出身和謹慎的中年女知識份子，突然一改常態，絕望地嘆息道：「我們的國家已敗壞至極，無藥可救了！」（註廿一）不過，正如一位學者曾審慎地指出：「這些要求正義和責任的普遍呼聲，並非代表人民直言反對現政權，而是要求更落實的推行改革。」（註廿二）

因此，在一九八八年五、六月期間，即「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一年，當時的國家總理兼代黨總書記趙紫陽在政治局第九次會議上表示：「我們這一

條船遇到了風浪，形勢嚴峻。」（註廿三）這並非巧言僂色，而是對當前情況的告誡。同年十月，《中國新聞分析》作了如下的評述：「整個經濟結構已被封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踏入四十週年後所面對的難題，是她有史以來最難應付的挑戰。」（註廿四）

政治改革

Antonio Gramsci在其《獄中札記》中寫道：

當舊的快要死去而新的仍未來得及面世時，危機便會發生。在這個真空期間，很多不同的病態徵狀也會出現。」（註廿五）這正好用來形容中國當時的情況。當經濟改革漸漸影響著國民生活時，便會令人感到如果政治不進行改革，經濟改革便無法落實成效，因二者相輔相成，彼此息息相關。事實上，早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至廿三日，鄧小平在一個秘密的政治局會議上，已提出了「改革黨及國家領導層」的建議。但直至一九八四年，才有大大小小

的會議討論政治改革的問題。結果，政治改革得以逐漸推行。

中共的黨委書記胡啓立曾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在上海一個學術界會議上表示，如果没有政治文化的改革來配合，經濟改革不單難以爲繼，甚至難以保存既有的成果。胡啓立曾與胡耀邦及趙紫陽在改革路上並肩作戰，但在「天安門事件」之後，胡啓立與趙紫陽同被擣出只有五名成員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註廿六）

同樣地，在後來成爲全國人大主席而當時是副總理的萬里亦會提出「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決定。」據報他在一個會議上，曾向各政府部門的黨委書記表示，作爲一個執政黨……應該開放自己，接受公衆監督，全力推廣民主，認真地實行民主中央集權制，並透過自我批評來自我完善。否則，黨的領導層便會因爲缺乏一個反對黨來制衡而變得腐化。這樣，先有官僚主義，繼有貪污腐化，最後，便會受到人民的摒棄。（註廿七）

無論如何，有關政治體制改革構想的方案在一九八七年十月至十一月所舉行的第十三屆黨大會上獲得通過。這次會議曾被譽為是「改革與開放的大會」。有關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具體程序都在這個方案中提及，令人推測當局會解除那些已經設立了超過三十年的「禁區」，令學術討論再度活躍起來，無可避免地碰到那些極度敏感和危險的問題：改革公有制。事實上，某些企業已開始把擁有權和管理權分開，改用不同形式的股份制。

簡單來說，政改的建議包括：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及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總括來說，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都堅守它的指導原則，並對政治權力絕不放鬆。在這底線之下，很多「新事物」只要不違反「四個基本原則」，都能夠被毛澤東以後的領導班子所包容接納，雖然近年來這些基本原則的定義已變得模棱兩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便是其中一個最佳例子。這些起初含糊不清的概念到了中共「十四大」才得以確立。（註三十一）

中國近代改革的指導原則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指經濟建設；而「兩個基本點」是指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個基

本原則」。「四個基本原則」包括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毛思想。這些指導原則不單在中共「十二大」獲得通過，並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十四大」內再被重申為「黨基本路線的基礎」。（註廿八）黨和政府努力地澄清改革的目的並非是削弱或廢除黨的領導，而是加強黨的領導能力。

進退兩難

另一方面，當新事物的發展嚴重地超越了所定下的底線時，強硬派便會起來鎮壓「反革命活動」。鄧小平曾對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強調：「正如我經常

說：『四個基本原則是絕無妥協餘地的。』」（註三十一）胡耀邦和趙紫陽便是被指不能抓緊「四個堅持」而遭革職。

這規範以著名的「收放」循環政策為基礎，成

為中共政權的政策和行使政策方式的特色。如此看

來，「天安門事件」及其餘波；以及最近環繞中共「十四大」的新發展，均可被視為「收放政策」的歷史循環。Lucian Pye 對此現象有很中肯的意見：如果一大堆溫和政策得到成功，而一個折衷的思想傳統又不足以確保政權繼承人的地位時，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便是增加制度性的壓抑政策。在中國人的務實傳統中，一向不視政治自由主義為一個理想的價值，政治上的容忍只能在權力不受影響時才能被完全接納。（註三十一）

Pye 進一步指出：

中國的政治節奏不像西方制度的左右搖擺模式，而是在中央集權與權力下放政策下，收放控制

的上落模式。領導層如感到有任何不安，便會令鎮壓的程度升級，亦很可能會引用更多思想理論，去為自己辯護。（註三十四）

領導層的分歧

國家領導層的分歧是中國近年出現的另一個問題。中國政治除了在人事上變化多端之外，不同的人事班子更導致在政策取向上出現分歧，使很多問題難以獲得一致的意見，這些問題包括：改革的緩急快慢、幅度、策略、效益和損失；另外是改革對社會秩序、大眾道德觀、國家團結安定、國際關係及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信條所造成的影响等。

然而，衆多問題困擾之中，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仍穩如泰山。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前兩年，鄧小平在一份內部文件中，對於那令胡耀邦倒台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他清楚地表示，「鬥爭」仍「至少會繼續二十年」，中國領導人不必理會其他國家人民的言論。（註三十五）之後，鄧小平雖然辭去了

所有黨政機關的職務，但他在一九九二年初南下一事，竟又捲起了一次「改革開放的旋風」，成爲「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另一盛事。當我們談論中國領導人的繼承問題時經常會問：當這位老當家「去見馬克思」之後，中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天安門事件」之後

中國改革在踏入一九八八年之後便面對重重困難。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領導層便推行經濟緊縮政策。因此，在往後的三年內（一九八九至九一年）或是一段更長的時間，改革和建設的重點便在於「治理整頓」之上。政府的「勒緊褲帶」政策已成功地冷卻過熱的經濟，並把通脹率由百分之十八減至百分之十。（註三十六）然而，……政策亦導致從事私人經濟行業的人數劇減，單在一九八九年，在私人企業的從業人數減少了三百六十一萬，跌至一千二百萬人。此外，政府實行一系列的緊縮措施亦導致一百萬名在計劃之外聘請的工人遭解僱，這

些措施包括：壓抑社會需求、縮減大型建設項目、限制借貸及將工廠生產減少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結果，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三點五，導致有五千萬「流動人口」到處尋找工作。近年來，這批數量龐大的「盲流」構成社會不穩，成爲社會罪惡的犧牲品。

（註三十七）

另一方面，「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在一切以國家安定爲先的原則下，促使「十三大」所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驟然告吹。政府把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肅清黨紀，懲治貪污」的問題上。因爲百分之六十九的政府機構都由黨員領導，所以在肅貪的同時，亦要清黨。官方口號稱這個工作爲：「黨建設的任務」是一件牽涉五千萬黨員的艱鉅工作。

經過這事件之後，中國領導人赫然發現「執政」黨與人民之間存在著一個很深的鴻溝。於是，中共便再次促請黨員走向人民，了解民情，「聆聽人民的心聲」，並重申「多黨合作」的方針。自一九八二年以來，中共一直以「長久共存，相互監督，彼

此真誠信任，禍福與共」來形容它與其他小規模「民主黨派」的關係。在一份於一九九零年初出版的重要文件中，中共有史以來第一次認定民主黨派的地位，稱這些黨派為「參與政府事務的黨派」。然而，一如所料，中共絕對權威的地位並沒因此而動搖。（註三十八）

與此同時，東歐和蘇聯所發生的巨變令中國領導層感到需要裝備自己來對抗「和平演變」的挑戰。他們認為這是外國侵略的一種新形式，就像以往中國受外國欺凌的情況一樣。因此，中國必須為對抗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而作長期的鬥爭，而最重要的便是努力維持國家的團結和穩定。在這個過程當中，公安部長點出六種「敵對勢力」，其中包括：西方戰略、台灣和香港的顛覆力量，以及「非法」的宗教機構和活動。（註三十九）在一份反和平演變的內部文件之中，美國被指運用「各種渠道，包括大眾傳播媒介、廣播機構及文化學術的交流活動，從內部搜集新元素，進行滲透性的反中國活動。」此

外，美國又被指責以「人權」作為製造國際反中國情緒的借口。（人權問題一向被中國當局視為國家內政。）（註四十）

在具體措施方面，由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五日開始，所有刊物在出版前都必須經過重新登記的手續。任何偏離黨的路線的刊物都會受到「整肅」。當局又下令各單位學習愛國主義、無我精神、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國家教育委員會為學生投考大專和出國留學制定新守則。大學畢業生要先「服務國家」，才准出國進修。此外，為所有出國的留學生，亦有具體的措施來作政治上的控制。（註四十二）

在這些林林種種的政治學習班中，參加者被迫接受思想訓練，並需表態支持政府的反民主活動。一位大學生無奈地表示：「我厭惡它（那些政治學習班），但卻不能不參加。」

可是，令當局感到震驚的是，北京大學共黨委員會在一九九二年國慶日前夕，為剛完成了一年軍

訓的新生作了一個意見調查。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被訪者對黨領導的信心表示「失望」或「相當失望」。（註四十四）

危機仍在

原先想藉改革來處理的問題並沒獲得解決，反而被深化和擴大了。有些人已不再高叫「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的口號，相反地，他們開始期待一個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誕生。（註四十六）Nicholas D. Kristof 於一九九零年五月中，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滅亡之時，便會剩下一個巨大的真空期」的文章，他寫道：

當一個世俗信仰的年代在中國崩潰之後，便會轉變為一個失落和憂慮的時期。人們不再相信什麼，也再沒有英雄……近年來，這種空虛感越來越嚴重。但根據在中國不同地方的訪問結果所得，不少中國人表示，在去年的「六四事件」之後，這種空虛感覺變得特別強烈。

（註四十八）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在學生和其他人民之間興起了各種不同的「熱潮」，包括：「西方思想熱」、「瓊瑤熱」（瓊瑤是台灣著名的女性小說作家）、「卡拉OK熱」、「跳舞熱」、「酒吧熱」、「電影熱」、「經商熱」、「出國熱」、「……」等等。（註四十九）

結果，正如一位政協委員所說：「中國不單市場疲弱，她的精神也變得腐敗起來。」（註五十）中共「十四大」會議的籌備工作便在這個環境之下進行，多少標誌著歷時三載的「勒緊褲帶」政策的結束。要改革重顯活力，便需要鄧小平多出一點力——他的在一九九二年初南巡及與黨內強硬派的角力戰便是最佳的例子。

中共「十四大」會議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至十八日中共「十四大」會議坦率地承認，在現階段（較早時）的社會主義，

「生產落後」追不上「人民在物質和文化上的需要」，導致原則上的矛盾。此外，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被寫入新憲法內。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代替了「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鄧小平稱讚它為一個「卓越的理論」，是中國在了理解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規律的「大突破」。（註五十一）在黨的路線問題上，大會強調須防右傾，但最主要是防左，因為兩者皆對黨構成本質上的破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的大會報告，這亦是本文所集中討論的地方。

江澤民在報告內提出，要為管理對外貿易完善經濟結構；深化經濟改革，好能盡早創造一個配合國際經濟標準的新系統。他強調要攬好經濟，便首先要加強科技的發展。因此，在策略上，教育該成為首要的發展對象。他又指出，知識份子所受的「科學和一般教育」是「先進的生產力量」。（注意這理念背後的實用主義思想和工具主義思想。）此外，該報告亦鼓勵「獨立研究」。（註五十二）

江澤民的大會報告題為「為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更大的成果，加速改革是對外開放及現代化的動力。」換言之，經濟改革：可以。政治改革：也可以，但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對黨政分家一事絕口不提，但卻鼓勵政企分開。江澤民在會上指出：「任何人如果懷疑、削弱或滅視黨的領導權威都是絕對錯誤的。」他更清楚地表示：「西方多黨議會制絕不可能在中國實行。」（註五十三）

明顯地，中共「十四大」又開始了另一輪「開放」遊戲。令人懷疑一個「中心」（經濟建設）能如何實際地聯繫「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及四個堅持）？早在一九八六年，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 Michel Oksenberg 曾預測，長遠來說，由中共所策劃的改革的成功機會在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之間。（註五十四）某些日本分析家認為，中國的情況是難以預測的，西化無可避免地為中國的政治帶來不穩。（註五十五）足以令人懷疑另一粒「天安門事

件」的種子，是否已埋在最近這輪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進程的土壤裡。此外，黨和政府又如何（或能否）處理它一手造成的「幼芽」呢？

人口是發展的主要問題

目前，中國人口已超過十一億三千萬人。據資料顯示，單在一九八二至九零年間，全國便增加了這一億三千萬人。主要原因是控制生育的措施收不到預期的效果，這個問題在人口佔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地方特別嚴重。生育率的增長達至千分之十五點五六，高出國家計劃出生率的百分之三點五六。（註五十六）一九九零年，在四億農工中便有一億八千萬人沒有工作可做。估計國家要為這些農工在其他行業裡提供就業機會，便要投資七千二百億元（約相等於美金一千五百億元）。另一方面，在過去數年，城市每年平均有四百五十萬的新勞工，國家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又需耗資巨款。（註五十七）

在人口「質素」方面，中共成功地把文盲的人

口比例由解放前的百分之八十減至現時的百分之十五點八八。不過，在農村的文盲或半文盲的人數比例便高達百分之三十五點九。在全國五億勞動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五是熟練的技術人員。此外，全國的嬰兒夭折率達百分之十三點零七，有三千萬人患有遺傳病，在全國約五分一的家庭裡，都有一名家庭成員具有體質缺陷。國家每年要花費一百億元（約為美金二十一億元）來照顧二百萬先天性弱智人士。（註五十八）

根據世界銀行在一九八八年的預測結果顯示，全球有八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其中二億五千萬是中國人。據中國本身的資料顯示，單在中國西面，便有二億人在貧窮線之下生活。（註五十九）在開放改革的過程中，無數的問題湧現。其中一些在數年來都被報章雜誌連篇報導，例如：地方發展不均、資源分配不均、貪污、經濟罪案、賭博、打架、搗亂、盜竊、青少年犯罪、吸毒、飲酒、色情刊物、娼妓、利己主義及「金錢至上」的態度。

其餘的問題是在較近期引起關注且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是一個好例子：不少天然資源（泥土、森林等）正面臨用盡的危機、城市的空氣及河流受到嚴重污染。據悉單在一九八八年內，全國生態損毀總值約為全年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註六十）然而，相較於中國的人口問題，生態問題仍屬次要。所以，國務院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國人權白皮書》可能並沒隱瞞事實，它一開首便指出：「衣食充足是長久在飢寒中生活的中國人民的基本需要。」而且，

「生存權」是「中國人民長期爭取的首要人權。」（註六十一）

一個持久的國家議程

中共在一個國家主義高漲的非常時期下奪取政權，特別在抗日戰爭時（一九三七至四五年）。（註六十四）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企圖以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來作爲社會主義理想的最高成就。（註六十五）然而，舊式的「中國式中央集

權制」已不能切合今日環境的實際需要。中國人民察覺到這個情況，但並不表示他們已放棄了社會主義至上的官方教條。相反，一個經過潤飾的版本正在出籠：中國是在世界大團體裡一個獨一無二的成員，注定要扮演一個與其人口、地理面積、悠久的歷史文化同樣「偉大」的獨特角色。對中國來說，現代化仍只是一個鑰匙。中國的現政權認清了這個情況，遂能說：「今日各國間的競賽，在本質上是一場國力競賽。」（註六十六）

跟以往不同的是，現代中國的危機感主要來自她意識到自己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她擔心自己能否有資格擠身在全球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中，這種對國運的憂慮導致中國缺乏安全感。在這個情況之下，中共別無選擇，只有繼續爲現代化的國家理想而奮鬥。這種思想在「十四大」的報告中表現得最爲明顯：「不少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我們的毗鄰，都已加快他們的發展步伐。我們若不迅速發展我們的經濟，便難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及維持社會的長期穩

定。」（註六十七）

一個突出的問題和議程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有一個現象：面對著最近發生的危機，一種自我懷疑的感覺在中國出現。這感覺在以往鮮會出現，卻在近年十分普遍。因此，《中國新聞分析》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報導指出：「中國的身份危機源自其政權合法性的危機，並且表現得十分明顯，但中國鮮有人敢談及這個問題。」（註六十八）

西方觀察家Orville Schell在較早時指出：

（中共政權）因為意識到她在人民之間所造成混亂和暴力而感到自我懷疑……因此，在八零年代中期，當局對何謂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定義又再一次引起爭議……中共當然覺察到這個問題，雖然她不願完全承認她在摧毀中國文化及破壞人民國家身份的責任。

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我懷疑感有三個層面：（一）對改革策略的正確性感到懷疑。中國在過往不是曾犯過一些基本錯誤嗎？誰人（及什麼）可保證中共不再重蹈覆轍？（二）對社會主義在解決中國問題的有效性感到懷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統治不是已經證明了它在中國行不通嗎？（三）對中國文化價值的懷疑。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權利義務的結構不是已被證明為另一個額外問題嗎？它們不是為中國現代化構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嗎？（註七十一）Nicholas Kristof在一九九零五月中寫道：

中國的信仰危機問題十分複雜，因為這個問題不單令當政者蒙羞，更令中國文化遺產的價值盡毀。無論是什麼政治信念，中國普遍都習慣以自己的四千年文化為傲。可是，越來越多知識份子擔心，中國的貧窮和極權統治的問題便是源自這個文化本身。（註七十二）

以上的分析肯定了Lucian Pye的觀察結果：「

中國社會在現代世界中摸索不定，未能肯定什麼能夠及應該作為道德需要的基礎。」（註七十三）

Herein 反駁說，無論在現在或將來，中國一直在創造新自我來重建自信心的巨大工作，俾能拋開歷史所造成的、已過時的自大（或自卑）情意結，在沒有恐懼和感到安全的情況下，真正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在前些時期，上述的情意結經常迫使她按一種狹窄的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政治文化意識來行事。最近，這種意識又以一個新的仇外形式出現，用來對抗被推測是西方世界所發動或支持的「和平演變」運動。

在這個情況下，有些批評毫不忌諱地指出：「中國的知識份子仍未能否認國家命運的問題與『個人價值的基本問題』有關。」（註七十四）因此，這裡所牽涉的問題和議程便與國家、文化及個人有關。

結語

回顧在一九六零年，已故中國觀察家先驅勞達一神父在評論當時的中國問題時指出：

中國所需要的是一个創新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但思想和計劃只是一個開始，還需繼續灌輸新的普遍信念；以及對人、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新想法……這個新面貌會是（或能夠）怎樣，便無人知曉。（註七十五）

我們在今天會知道更多嗎？教會在中國現代化的曲折路上，又可否或能夠提供怎樣的服務呢？

（註釋見本刊今期英文版第27頁。）